

检论《文赋》

吴林伯

先秦文论，只有片言；两汉以后，碎语以外，尚有专篇，但都限于一文、一书、一体的评议。唯曹丕的《典论·论文》，品藻建安七子的短长，能自树立，内容由狭而广，殆为原始的文学概论。出现文论发展的新起点，影响最为深远。再到西晋，皇室不靖，争夺相杀，名士少全；重以诗人“稍入轻绮，力柔於建安”^①。於是知凡之士，有逃而逃，或咀嚼文义，假论文以寄心。象陆云的《与兄平原书》既论叙前哲，时贤的文章得失；傅玄的《七谏序》，左思的《三都赋序》，也考镜诗赋原流崇卑。至於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说解文体的名义法度，结合实际，语不虚设。然而完整无缺，师范《论文》，扩而充之，以达文论高峰者则为《文赋》，衣被后代，《文心雕龙》其尤著者也。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此曰“文赋”，当为篇名，非“文”与“赋”，夫以机之才，未有二十始作是二者也，《晋书·陆机传》不称机作《文赋》，不得据以断言《文赋》非机之作。盖史家为人作传，或录其作之首出者，次焉者缺而不录，故司马相始著《犬将篇》，扬雄撰《渊纂篇》，《汉书·艺文志》皆录，而《传》具不见，是其明证。如前所述，萧统直以机之《文赋》为“论文”之赋，宜其然乎！

印度释氏说法，特重因缘，我国学者亦如之。则於著作年代之考订，不可忽视。今人对《文赋》年代，曾多差池。殊不知李善注《文选·文赋》，摘引臧荣绪《晋书》，早已显白之矣，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与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师，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相见如旧相识，以文呈华，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按这段文字，辞意爽朗，共晓为易。余尝试析之，机虽“天才”不凡，又为世臣之子，夙有一定教养；但从小入仕，无暇专心学问；惟年既“二十”，国亡里居，与弟云长期共学，切磋琢磨，“熔铸经典之范，翊集子、史之术”^②，校练附辞会意之规矩，行复幽思属文，讨论修饰，杼轴献功，竟成鸿笔，以致“当时独绝”，“誉流京师”，而权臣张华之徒，皆知名作者，赏其文而“重其名”，遂以“征”之，犹韩非以其《说难》《孤愤》之论，长卿以其《子虚》之赋，见知於秦皇、汉武而承召也，然则，自曹丕、刘勰诸氏观之，必能文而后能论文，自然之道也。机“呈”张华之“文”，公然“系踪张、蔡”、“张、蔡”赋之巨匠也，而机踵之，故擅於赋，以赋论“心识”之“文体”，则《文赋》为论文之赋，义已明矣。张华亦常论文^③，而机“入洛”所“呈”之“文”，不无《文赋》，而《文赋》为“入洛”前作，臧荣绪《晋书》，正在昭著是旨，以理推度，固无疑也。何焯读书得间，曰：“此赋殆入洛之前作”^④，吾尝歎此达言，以为美谈。然焯怪“老杜云‘二十作《文赋》’，於臧《书》稍疏”，其百虑之一失欤！夫何氏所谓於臧《书》之

“疏”，以其断机於“二十”之年作《文赋》，嫌过早耳。苟泥文立论，机以“二十”吴亡，始与弟云“勤学”而未精，即作“妙解情理”之《文赋》，似不可信；然弗以辞害意，而以意逆志，求之古文成法，则“二十”实为牵就句式，以言成数，犹《诗》三百五篇，而曰“三百”⑤；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而曰“三万”⑥；左思十年赋《三都》，而曰“左思练《都》以一纪”，为与上句“张衡研《京》以十年”⑦相偶，而易以“一纪”，“一纪”，十二年也，则“老杜”曰“二十”非实数，断可识矣。况机忠吴，吴灭，严於君、臣之义，仇晋，誓不事二姓。要以藏器待时，有所作为；每以祖、父有大勋於江表，深恶庸主孙皓举而弃之，遂作《辨亡论》，以论皓之所以亡，并斥晋师为“强寇”，兼述祖、父之功业；反晋悼吴之愤，见乎文辞；抑机鉴察伯嗜著《祖德颂》，因以述作欲褒扬祖考为先，於是作《述德》《祖德》二赋，《文赋》虽以论文为宗，亦首言之，与二赋相应，庾信所谓“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⑧者，倪璠为注，辄以“世德”指《文赋》所云；故机序《文赋》，称“慨然投篇命笔”，微露《文赋》为被迫暂隐，心绪悲伤时作也。且机入洛仕晋以后，适天子失权，封王犯上作乱，四海荡然，机、云敌晋之心如故，知复国不能，仍拟“匡世难”，不愿东返，权事异朝，参与贾谧二十四友，转徙诸王之间，仿佛大乘“菩萨行於非道，是为通达佛道”⑨，孔子应佛胎之召，能“磨而不磷，涅而不缁”⑩，虽下无以文发其背叛司马氏之情，然洞悉人或疑其有“异志”，故恒如临深履薄，慄慄危惧，唯危行言逊，外柔顺以避咎，其所赋者，亦只《怀土》《叹逝》《思归》；岂敢借论文颂“先人”“世德”之“清芬”“骏烈”以招祸哉！或以陆云《与兄平原书》曰：“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而此《书》又称“张公父子亦语云”，“洛中勿勿少暇”，明为入洛之作，便以其“文赋”为篇名，断以《文赋》是机入洛后之制，误矣，何以知其然？盖此云“文赋”者，泛指当世之“文”与“赋”也，“甚有辞”者，“辞”之“淫侈”⑪，不免为“绮语”也。《大乘起信论》戒修行者“不绮语”。郗超《奉法要》：“何谓绮语？文饰巧言，华而不实。”这本西晋文士通病，《文赋》造语笃实，文、质相称，没有“绮语”，而机其他“文”“赋”间或有之。故其弟云反复以书相告，曰：“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多。”曰：“兄文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⑫张华见机文章，以为“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冶，谓机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⑬“冶”犹“多”者，文辞不清省而“冗长”为绮语，云、华皆病之，惟云曰“微”，华曰“太”，主善为师，我从华说，刘勰同乎旧谈，亦讥机“思能入巧，而不制繁”⑭。诸如此类，皆斥机“文”“赋”体势不纯，瑕、瑜互见，孙绰所以谓“机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⑮也，然则，云《书》“文赋”非《文赋》，亦昭昭若日月之明矣。

众所周知，《文赋》研究者分歧最大的是理论的主导因素。老子说他立“言有宗”⑯，任何理论家都有始终贯串的“宗”或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不弄清这一点，就不可能通达他的理论，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晋书·陆机传》称机“服膺儒术”，一言以蔽之而准，我们遍览士衡的诗、文，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赋》殊无二致。所以篇中强调作者缀文以前，必须“颐情志於《典》《墳》”，而《典》《墳》即三《墳》五《典》，为儒家所传颂的三皇、五帝之书，孔子据以删订六经的历史文献，作者的“情志”，一定要从中“颐”养；不仅如此，《文赋》还要求作者“漱六艺之芳润”，“六艺”，六经也，李善注未谥，吸取六经的精华，而喻之以“芳润”，岂不是拾取其高妙的辞意；不仅如此，《文赋》又“嘉丽藻之彬彬”，盛赞孔子“文、质彬彬”之旨；不仅如此，《文赋》声言“伊兹文之为用”，在“济文、武之将坠”，推尊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我们从李善注里，便发现《文赋》的辞意吸收了《诗经》《周易》《尚书》《论语》《礼记》及孔安国、毛萇、杜预等儒家经典、传、注的指归。

不可否认，《文赋》有时运用老、庄的词汇，但都加入新的内容。比如：“位中区以玄览”

的“玄览”。见于《道德经》，是说作者站立在天地之间，深远地观察万物，从而致知，不是老子的“虚静”玄默，泯绝知巧；“方天机之骏利”的“天机”，出於《庄子·大宗师》，“天”有自然的意思，是说作者目睹“秋叶”“春条”所兴起的、自然而不造作的悲、喜心情，不是庄周的与外物无涉的“天然机神”。古汉语内词同义异之例，不一而足。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④这儿的“无为”，不能视为庄周的任其自然，而是有为的一种手段，荀卿解释得好：“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⑤天子使臣、民各安其位，尽其职责，而他自己也就无所劳作，若无所为，而实有为，以致“势至重而形至佚”⑥有为。显然，此等“无为”，与庄子的“无为”异趣，不可同日而语。孔子之道的核心为仁，仁之为用是礼，教人博文约礼，履而行之；陆机崇儒，“非礼不动”⑦，醇然儒者，怎会以道家思想论文？

陆机说他“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⑧《周礼·考工记》郑玄注：“称，等也。”合也。“逮”，及，谓达也。我们领会陆机这六句话，应该注意“患”字，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认为属“文”命“意”，很难与“物”、“意”相符合，如实地表达出来。事实证明，有这种“患”或毛病的人，自古而然，春秋、战国社会的变通，宜先任武，而孟子“迂远”，游说齐、梁，乃述唐、虞、三代之文，不切於时势，“意”之“不称物”也；韩非主以气力相争，偃文任武，为秦皇所重，“意”之“称物”也。张融作《海赋》，以示顾凯之，凯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露。”⑨添比四句，则“意称物”，而“言”始“逮意”了。陆机表示他之所“患”，亦为由衷之言。魏以腐败，晋灭之，自然之势也。东吴犹与晋敌对，主昏国乱，晋亡之，以一四海。人心所向，而机以晋为“寇”⑩，冒天下之大不韪，“意”之“不称物”也。陆云以机之《祠堂颂》“了不见出语”，读之，“了无所识”⑪，“文”之“不逮意”也，夫作者“睹物兴情”⑫，则“情”所以写物见物深，写“物”之“情”与“物”合而精，发之於言，则“言以知物”。刘宋山水诗以诗人平时“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有以观其会通，发言为诗，则“巧言切状”，“功在密附”。使读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⑬，正是“意”之“称物”，“文”之“逮意”，而“言”足以“知物”。《淮南子·主术训》：“出言以副情。”“副”，犹“逮”也、“不逮”，则“文”失实，允为大病。所以王充在其《论·物势》里写道：“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文”“意”若是，确非易事，总之，陆机之言有中，显而易见。可是孙月峰以“文不逮意”，“自‘言不尽意’来，於是有的人以“文不逮意”与魏、晋玄学家“言不尽意”的论题有关，就大谬不然了。因为玄学家曰“言不尽意”是说“言”有不能“尽意”的局限，而机曰“文不逮意”恰好相反。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辞取达意而止，辞的最高造诣为达意，学者多从其说，《墨子·经说上》：“执所言，而意得耳。”《吕氏春秋·离谓》：“夫辞者，意之表也。”《太玄·玄莹》：“是以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如此等等，可谓以“辞达”意传笈，而陆机居之不疑，因此，他要求作者行文，必文与质称，不以辞胜“冗长”为病，以“辞达理举”为准绳，相信《文赋》中“有文不逮意”之“患”，而“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也就是“文”能“逮意”；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陆机决无背孔子“辞达”之义而雷同玄学家“言不尽意”之心。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言不尽意”一语，最初出於孔子之口，《周易·系辞》的作者唯恐世人曲说，便因孔子的话提问：“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子知“圣人”指作《易》者，则援卦、象作答：“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孔子以为“圣人”设立“卦、象”，以“尽”万物的“情、意”；而后来学《易》者“系”联，“尽”发其言，能将“卦、象”所“尽”万物“变通”“鼓舞”的“神、利”或“情、意”体现，而曰“尽”者，谓无遗也，这

与“辞达”的命题，若合符节，无出言自相矛盾之嫌。也许有人质问：“孔子明言：‘言不尽意’，你如何处置？”我的回答：“我们读书会意，都得用孟柯”说《诗》的方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的方法，如果死叩“文辞”，拘文牵义，势必误会周宣王时大旱肆虐，人民死的一个也不留，殊不知诗人实以夸饰的手法，极言死人之多。孔子云“言不尽意”，可以等量齐观，曰“不尽意”，极言以“言尽意”之难，而难非不能，《系辞》引孔子之言：“圣人之情见乎辞。”斯岂非“言尽意”乎！“夸饰在用，文岂循检”②①！“夸饰”在修辞上的运用，总不循守常规，而以特殊的语言艺术；孔子经常这样。为了读者的信服，我们不妨再举几例。“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②②。决不能“以辞害志”，认为孔子以当时真无“好学者；孔子不是以“好学”②③自居，又盛讚孔文子“敏而好学”吗！朱熹“以意逆志”。注曰：“既云‘今也则无’，又言‘未闻好学者’。盖深惜之，又以见真‘好学者’之难得也。”孔子见颜回“闻一以知十”，乃告子贡，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②④重言“弗如”，以见颜回悟性之强，决不能“以辞害志”，认为孔子以己与子贡真“弗如”颜回；“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於予与何诛极言宰予之情而痛责之，爱之深，责之严，决不能“以辞害志”，认为孔子喻“昼寝”以“朽木”“粪土”，将不可救药而弃之。孔子之於弟子，至为涵容，子路尝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孔子许之②⑤，孔子精心教诲子路，终成七十有二高弟之一，则孔子徒以“昼寝”而弃宰予，万无是理也；老子云：“君子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又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人之不善，何弃之有！”②⑥，其孔子之谓欤！王充不察，曰：“昼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是不“以意逆志”之讹也。抑彦和崇儒通经，曾以专篇标夸饰“喻真”“不诬”之要②⑦，昌言“言不尽意，圣人所难”②⑧，其信然矣，“言”之尽意，诚然知言，玄家之论，不可为训，识者不与，故欧阳建应机以《言尽意论》驳之，而“言、意”之辨兴，王导南渡，“道言尽意”②⑨，舍人因之，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以“言”之“尽意”反玄家之妄言，离离如星辰之行矣。

我们只要细心揣摩，就不难不发现《文赋》的主导思想源於《周易》。郑玄以《周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③①，是《易传》和《易》学家观念的高度概括。所以《系辞》以宇宙的一切事物“变动不居”。务必“变动”，才能适时地生存，有活力，阮籍乃以《易》为“往古之变经”，《易》卦“终於《未济》，象征“变动”永无穷尽，终则又始，始非复旧，而为新的开端③②，事物从而趋时、日新。那末，“变动”的规律是什么？《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之为言规律也，万物总以“阴、阳”二气的合和的规律发生、发展，而“阴、阳”仿佛万物“变化之父母”③③，这个万物化生的规律，确是这样的，而且非常简易，换句话说，万物化生的规律的特点是简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③④。故旁通而无滞，百姓日用而不匮。”《易》之为书，广大悉备”③⑤，而其指归，无非“三义”，真是“百物不废”③⑥，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现在，我们要以《易》之“三义”来剖析《文赋》的主导思想。要是“沿波讨源”，尽先以《易》的“不易”“变易”二义论文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曰：“夫文本同而未异。”“文”的“本、未”具体指什么。《论文》以音乐比方，曰：“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苍颉篇》：“检，法度也。”《文选·演连珠》李善注引“均”，犹“同”也，避重而变、“曲度”二句，互文见义，实以乐人演唱歌曲，调剂“节奏”的抑扬，有着共“同”的法度，此之谓“本”；至於乐人用“本”“引气”的法度，临机应变，多种多样，却不“齐”一，此之谓“末”。“本则作者之所共循”，故

曰“不易”；“未”则乘势而异，故曰“变易”。《文赋》始以“三易”之义畅论文章，臧荣绪称陆机“心识文体”，《文赋》是论“文体”的专论。“体”，一般解为体裁，非也，因为《文赋》讲的并非文章的体裁，《论文》以文章的风格随体裁而异，《文赋》同此“前论”^②，以诗、赋等十种体裁，参验不同，风格有别；与陆机同时的挚虞《文章流别论》才是体裁论的专书，《文心雕龙·总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汎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在刘勰看来，《文赋》的内容极为丰富，而“文体”之“论”毕竟不完备，核实而言，“体”即《论文》所谓“本”。考古籍里的“体”字，为用多途，我们姑就“文体”设想，孟柯言事物的“大体”^③，韩非著《大体》以论政。《尔雅释诂》“则，法也。”《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体，法也，”故“大体”，即“大法”，系动作的基本原理，臧荣绪省之曰“体”，以谓陆机“心识”的修辞准绳，如网之纲，衣之领，作者执以修辞，无异伐木者“操斧伐柯”^④，不可须臾相离，我们观溯索源，便知早在孟柯，曾以制造任何器皿，都有技巧，那怕“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⑤；因此，“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⑥，“规矩”是制器皿的“大体”，高明的工匠一定要掌握，并用它教训徒弟，徒弟也一定要向师傅学习这种“大体”。值得注意的是孟柯以《易》之“不易”“变易”二义，肯定“梓匠轮奭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⑦，强调制器皿的“大体”，固定不变，应先学习，普遍使用，可以言传；至於使用它把器皿制得巧妙的法则，恰好与“规矩”相反，则不固定，不能言传，必须工匠在实践中去领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与孟柯并生的庄周，他和老聃都是通《易》的思想家，也以《易》的“变易”之义，称造车轮的工人，“有数存焉”，而“数”“得於心而应於手，口不能言”^⑧，贵在工人临机应变，灵活操持，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关于修辞技巧，以《易》义而言“变易”“不易”的观念，权與於曹丕，陆机又从而引伸之。他郑重告诉读者，“盖所能言”之“体”，“具”於《文赋》，李善注对了：“盖此言文之体者，具此赋之言。”“此赋”，《文赋》也，凡固定而能言传的“文体”，《文赋》都谈了；“若随手之变”的“数”，“良难以辞逮”，真难于言传；譬如文章的“丰约之裁，俯仰之形”，莫不“因宜适变，曲有激情”，“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总之，《文赋》只能讲不变的“文体”，不能讲变的“数”。然而“体”“数”这对矛盾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依赖、制约，“体”无“数”，则无以呈其效；“数”无“体”，则无以见其本，曹丕、陆机都“体”“数”并举，就是这个缘故，刘勰同此“旧谈”^⑨，他言作赋的准绳，曰“大体”；说为奏的准绳，曰“体”；他辨“体”“数”之别，曰：“夫设文之体有常”^⑩“常”，不变也；又曰：“变文之数无方。”《礼记·檀弓》郑玄注：“方，犹常也”，“无方”，犹“无常”，变也，故“名理相因”^⑪，“名理”，“体”也，以其恒久不刊，故谓之“旧规”^⑫。他以文成以“体”，而以“体”修辞，固“无定检”^⑬，“检”，法也，惟其无定，则必“变易”；“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作者必“随变适会”，而“莫见定准”^⑭；是以应变之“数”，微妙玄通，“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言”“笔”无法形容，谁要明白，只有自己“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真象“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⑮似的。

难与并能的，陆机还以《易》的“变易”之义论文章的“多变”，作品的形势“屡迁”，有其万变之殊，而变实根於情理，情理随外物推移，有其“悲、喜”之分，文章相应而变，据情理以“立文”^⑯，不翅於扶植树的根干，若尔然者，表里相资，外、内圆合，文、情未有不并茂而美丽者也，可喜的是陆机深识奥鉴，更以《易》的“变新”之义，楷定文章以变而新，变虽为“进、退之象”^⑰，“进”究为总的趋势，事物的笃实、光辉，賤是之故；而变之新，又非突如其来，必有所因，因而革之，则以“去故取新”^⑱；陆机知其如此，他信奉扬雄的名言“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⑲；曰作者放言遣词，“伏他人之我先者，防有“因”而无“革”也、文章犹其他

事物。“在变则通”④，“变”为“通”的前提。故自“因”而“革”，而“通”而“新”，善於适变者，必“袭故而弥新”，若天之行健，日前进而不息，是文之精者，可被之金石，施之乐章，流诸管絃，为世所重。刘勰同此“旧谈”，更以旁通发挥，《文心雕龙》的《通变》，是《系辞》“变通”“趋时”的义疏，它联系文学史，说明文章是社会的历史范畴，自太古以来，文章殆如水之东逝，不舍昼夜，亦若林之无静树，唯变所适，不断出现新色，而变不徒陈陈相因而已。汉代的辞赋，象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马融的《广成》，扬雄的《校猎》，张衡的《西京》，都承“汉初”的“夸张声貌”，“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莫不相循”⑤，不知所以“革”之；故变而不适，不新不“逆”，但以“侈”为累。而作者应该看到，文章的情、辞，都“环流无倦”⑥，“辞以情发”，而“情以物迁”⑦。“辞采”“九变”，而变的结果是“日新其业”⑧，“玄圣”之“道”，虽“然然相袭”，而“辞采”之变，则“超前轡”⑨。以“体”而变的法则，不外“参伍因、革”，不蔽於一曲。“古来”的“辞人”，他们“异代拔武”，没有哪一个不是“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⑩，而文章之变的功绩，在於“因、革”的“参伍”结合，屈原“因”《诗经》的《风》《雅》而“革”，用能“取谄经意，亦自铸伟辞”，创造“惊采绝艳”的《离骚》，允为辞赋之祖。

很清楚，《文赋》没有“易简”的字眼，可是“易简”之义，却形乎辞表，自文章着眼，“易简”盖谓收敛而不恣纵，是之为正，否则邪矣。所以文章必须美丽，美丽必须“文·质相称”⑪，凡“文胜质”的“史”，“质胜文”的“野”⑫，都失正而邪，美丽以淫。与“易简”背反，正常的“丽藻”，则“辞达理举，无取冗长”，为物则“穷形尽相”而止，不以烦滥为工；然此非一蹴而就，其必有以致之者。《系辞》：“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啗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文章的风姿，一决於人之情质，孔子深入弟子，“五行不与二三子共之”⑬。由於同弟子生活在一起，知之深，而言之切，以为子羔“愚”，曾子“鲁”，子张“辟”，子路“喭”，皆以一字，而中肯綮，这固然与孔子通明《易》的“易简”之义，而且以“简易为尚”的观念有关，而决定因素是熟悉弟子，“达心，则其言略”⑭。“略”者，“易简”也，故陆机以作者“天机之骏利”，是“心”之“达”，则其辞不“纷”而“理”，“易简”而不繁杂，上论“孝尔”而“寡尤”；“及其六情底滞”，理翳翳而愈伏，心以不“达”，乱而无章，无论“易简”，“台毫”竭情而多悔，此其一；文章要做，做者锤炼，是《易》之“贲”饰，孔子由是而“修辞”“草创”之后，必继之以“修饰”“润色”⑮，以锤炼求其“易简”。陆机以世之作者，鲜能无病，“或辞害而理比，或言聊而意妨”，文辞的“理”“意”失调，而芜秽丛至，倘欲“从之”而“双美”，则必“考殿最於锱铢，定去留於毫芒”，“铨衡所裁”，“固应绳其必当”，使语无疵赘，省净而纯粹·刘勰也同此“旧谈”，言之视陆机详皙。他直指刘向情性的“简易”⑯，高兴“自晋来用字，率以简易”⑰；欣赏《尚书·伪毕命》“辞尚体要”的论点，并以“体要”者，“体於要”也，《广雅》：“要，约也，”“约”者，语言之约束。故或“要约”连文⑱，谓“易简”也。文辞所尚，在以“要约”或“易简”为法度，“文约为美”⑲，“约以正辞”⑳，，文辞的美丽、正常是“要约”。“圣人”作经，则“或简言以达旨”㉑；孔子著《春秋》，则“一字见义”㉒；诗人体物，则“以少总多”㉓，“易简”的规格是“辞约而旨半”㉔，言简而意该。而“易简”的条件，首先是作者对事物认识的切至，“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㉕，因此，刘勰断言：“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㉖，这两句为对偶，辞有颠倒，实以作者的“论精”而后“语要”，故“体”势“极”为“要”约；“心游”而后“句窜”；“游”，认识疑而不定”。窜，语言漂荡散乱。故体势“极”为“繁侈”；文辞的“繁”“要”，一决於认识；其次是作者对“文术”的掌握，刘勰不满某些作者，虽“欲练辞”，而“莫肯研术”，“弃术任心”㉗，“而委心逐辞”，“骈赘”以“多”，而不“易简”，何以治之？曰唯“铨裁”，或“规范本体”，以求义之精；或“剪裁浮辞”，以求文

之约^⑩。於是“捶字”“结响”^⑪，斟酌繁、略，不少一字，不长一言，若谢艾之“繁而不可删”，王济之“略而不可益”^⑫，无“骈拇枝指”^⑬，而“繁约得正”^⑭，斯可谓“易简”之至，而“易简”不以篇幅之短、长而决，以辞、义之便洽而定，亦文外重旨。

注释：

- | | |
|---------------------|--------------------|
| ① 《文心雕龙·明诗》。 | ③⑩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 ②⑤⑥ 《文心雕龙·风骨》。 | ③⑩⑪⑬⑭ 《周易·系辞》。 |
| ③⑬⑭ 《世说新语·文学》及刘孝标注。 | ④⑤⑥ 《孟子·告子》。 |
| ④ 《文选·子虚赋》眉批。 | ⑤ 《孟子·离娄》。 |
| ⑤ 《论语·学而》。 | ⑦ 《孟子·尽心》。 |
| ⑥ 《诗·鲁颂·閟宫》。 | ⑧ 《庄子·天道》。 |
| ⑦ 《文心雕龙·神思》。 | ⑩⑪⑬⑭ 《文心雕龙·通变》。 |
| ⑧ 《哀江南赋序》。 | ⑩⑪ 《文心雕龙·章句》。 |
| ⑨ 《维摩经》。 | ⑫ 《文心雕龙·神思》。 |
| ⑩ 《论语·阳货》。 | ⑬ 《周易·序卦》。 |
| ⑪⑬⑭ 《文心雕龙·情采》。 | ⑭ 《太玄·玄莹》。 |
| ⑫⑭ 《与兄平原书》。 | ⑮ 《汉高祖功臣颂》。 |
| ⑬⑭ 《文心雕龙·才略》。 | ⑯ 《文心雕龙·时序》。 |
| ⑮⑱⑳ 《世说新语·文学》。 | ⑰ 《文心雕龙·封禅》。 |
| ⑯⑱ 《道德经》。 | ⑱ 《论语·雍也》。 |
| ⑰ 《论语·卫灵公》。 | ⑲ 《论语·述而》。 |
| ⑱ 《荀子·王霸》。 | ⑳ 《穀梁传》僖二年。 |
| ⑲ 《荀子·正论》。 | ㉑ 《论语·宪问》。 |
| ㉑ 《晋书》本传。 | ㉒ 《文心雕龙·体性》。 |
| ㉒⑳ 《文赋序》。 | ㉓ 《文心雕龙·练字》。 |
| ㉓ 《辨亡论》。 | ㉔ 《文心雕龙·铭箴》。 |
| ㉔ 《文心雕龙·论赋》。 | ㉕ 《文心雕龙·议对》。 |
| ㉕⑲⑳⑳ 《文心雕龙·物色》。 | ㉖ 《文心雕龙·征圣》。 |
| ㉖⑳⑳ 《文心雕龙·夸饰》。 | ㉗⑲ 《文心雕龙·宗经》。 |
| ㉗⑳ 《论语·公冶长》。 | ㉘ 《文心雕龙·附会》。 |
| ㉘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㉙⑲⑳⑳ 《文心雕龙·镕裁》。 |
| ㉙⑳⑳ 《文心雕龙·序志》。 | ㉚ 《文心雕龙·总术》。 |
| ㉚ 《通易论》。 | ㉛ 《文心雕龙·章表》。 |



(上接第128页)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为例，给出了完整的分析过程和结果解释，使人受益非浅。此外，还专辟一章讨论提高预测精度的若干方法，诸如适应的校正预测，残差相关校正法，回归校正法，临界值校正法和预测组合的策略；后者乃是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的比较试验研究得出的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新结论。

也许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未能把处理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决策问题的重要方法，诸如模糊评判、层次分析法(AHP)等纳入该书，希望作者在该书再版时予以考虑。

总之，作为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我认为再版的《经济预测和决策技术》，是一本立意精深、雅俗共赏的好教材，并以欣喜的心情推荐给其他读者。